

\* [西南历史文化研究]

主持人: 蓝 勇

主持人语:民族历史源流的考证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十分传统的题目,老一辈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民族众多,源流复杂,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上古民族源流现在许多问题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巴人羌人说是巴人源流说的一种。朱圣钟的《“巴人源于古羌人”说质疑》,用文献史源学、历史人类学方法,对传统巴人源于羌人说提出商榷,其提出的太皞并非伏羲氏、板楯蛮非羌人,廛君非羌人,父子连名制的范围广泛,进而证明巴人非来自羌人,其考证严密,分析理性,结论可信,对理清巴人源流有学术价值。我一直认为,民族源流的考证,一定要尽量避免望文生义、望音生义,传说证史的范式,少用文字音转、假借之类的方法来证明民族源流,民族流源的研究要依靠历史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特别是体质人类学的体质特

征聚类分析、现代的DNA技术等方法和手段来解决问题。何玉红的《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讨论了南宋川陕地区军粮的余买与转运,关注川北地区陆路交通和嘉陵江水道在南宋军事交通中的重要地位,是我们了解宋代军事物资转运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一篇重要文章。其文对南宋川陕陆运交通与水运交通的差异的特点总结,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时代水运交通的地位有裨益;同时文中分析了军事运输对于交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分析了军事交通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较为客观辩证的。值得指出的是嘉陵江在四川航运历史上的地位是仅次于川江航运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某些特定的时段,甚至比川江的一些段落更重要。但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故我们期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 “巴人源于古羌人”说质疑

——兼与彭官章先生等人商榷

朱圣钟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要:**关于巴人的起源,有学者提出巴人源于古羌人的观点,该文作者针对此观点的相关论据,从巴人始祖太皞伏羲氏、板楯蛮与羌人、廛君蛮与羌人、父子连名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巴人源于古羌人的观点难以成立。

**关键词:**巴人;羌人;太皞;伏羲;板楯蛮;廛君蛮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5-0054-05

关于巴人的起源问题,彭官章先生等撰文,阐述了“巴人源于古羌人”(以下简称巴羌说)的观点<sup>[1]</sup>。笔者通过对此观点的相关论据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此说还存在许多的疑点,巴人源自古羌人说还有商榷的必要。在巴羌说的论据中,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有疑点,值得商榷:

### 一、关于巴人始祖太皞伏羲氏的问题

巴羌说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中“西南有巴

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及《路史》中“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务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的记载。彭官章先生等人将太皞、伏羲等同为一人,并根据荣氏《开山图注》、《帝王世纪辑学》的记载“伏羲(太皞氏)生于成纪”,断定伏羲(太皞)源于古羌人,巴人既为伏羲(太皞)的后裔,则巴人为古羌人的后裔。

《山海经》和《路史》记载巴人的世系时文字上是有区别

\*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朱圣钟(1973-),男,土家族,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07BZS037),项目负责人:朱圣钟。

的,涉及其始祖时,《山海经》说“太皞生咸鸟”,而《路史》说“伏羲生咸鸟”,这里涉及的“太皞”和“伏羲”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太皞(或称太昊、大皞)、伏羲的出生地、图腾、世次关系、姓氏均不相同<sup>[2]</sup>。从出生地来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虚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诗补传》卷二十九载“营丘,太皞之后爽鸠氏之墟”,《礼记·月令》疏载“东方之帝,谓之太昊”。陈在今之河南淮阳,任在今山东济宁,宿、须句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sup>[3]</sup>,营丘的位置还有争议,一说在今山东淄博,一说在今山东昌乐<sup>[4]</sup>。从这些地域范围来看,太皞的居处地应该在今山东半岛和河南东部一带,与当时的中原诸夏相邻,且位于诸夏之东,故《礼记》称太皞为东方之帝。太皞氏族“以服事诸夏”,在“侯、服、甸、要、荒”的五服中,处于第二等级的“服”,则说明太皞氏及其后裔并不属于“诸夏”系统,因此有学者说太皞氏为东夷也是有道理的<sup>[5]</sup>。这里我并不想去讨论太皞氏是不是东夷,可以肯定的是,太皞及其后裔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是在东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而伏羲的出生地,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首人身”,荣氏《开山图注》、《帝王世纪辑学》也有相同的记载。关于成纪,《路史·国名纪》载“成纪,今天水治,汉属天水,东汉属汉阳,唐属秦州,州元(原)治上邽,而成纪本治小抗川。开元二十二年地震,自上邽徙治敬视县,亦移入新城。开宝元年,州还治上邽”,《广纪》云包(伏羲)于此生”,则其大致位置在今甘肃省的天水、秦安一带,关于伏羲的出生地的大致范围,彭官章先生等人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sup>[1]</sup>,也就是说,伏羲的出生地在西北。太皞和伏羲的出生地一在东,一在西北,可见二者的出生地是不同的。

从图腾来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孔颖达疏引服虔称“太昊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这充分说明太皞氏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生于成纪的伏羲“蛇首人身”,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载伏羲“蛇身人头”,明陈耀文《天中记》卷22亦载“伏羲人头蛇身”,不管是蛇首人身,还是人首蛇身,伏羲氏都与蛇有密切的联系,显示伏羲氏是以蛇为图腾的部族。这说明太皞和伏羲的图腾也是有差异的。

从世次关系来看,《韩非子·说难》、《易·系辞》、《礼记》等载上古之世,先有有巢氏,后有燧人氏,再依次有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伏羲氏的世系较为明确。太皞(或称太昊、大皞)在先秦文献中与伏羲并无任何瓜葛,正如前文所述,太皞只是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为齐、鲁等国所并,融入华夏,到秦并天下,“其淮、

泗夷散为民户”<sup>[6]</sup>2809,东夷此后完全融入华夏族之中,太皞(或称太昊)氏以后也被纳入到华夏族的帝王世系之中。由此可见太皞氏本不属于华夏族的帝王世系。可见太皞与伏羲的世系也是不一样的。

从姓氏来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太皞氏“风姓”,杨铭先生据此推断太皞氏为风姓<sup>[5]</sup>。而伏羲氏,《左传》杜预注“共工氏以诸侯霸九州者,在神龙前、太昊后”,《国语》韦昭注“共工氏在羲农之间”,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载“宓羲之后已经数世……诸侯有共工氏”,《国语》贾逵注“共工氏姜姓”,彭官章先生据此认为伏羲氏为姜姓<sup>[1]</sup>。若上述二说成立,则太皞氏自为风姓,伏羲氏自为姜姓,二者姓氏不同,可见二者并非同一人。

从上面对太皞、伏羲的比较来看,我们很难把太皞和伏羲等同起来,因此,彭官章先生等人将太皞视为伏羲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

既然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为什么后来的传世文献中又将二者等同起来呢?这可能要归咎于汉代以后的学者了。在先秦的史籍中,太皞(或称太昊)与伏羲是分开记述的,二者间并无任何关联,如战国末年的荀子在其《正论篇》中言“太昊”,而在《成相篇》言“伏羲”,荀子并没有将其等同而是分开记述,可见二者并非同一人。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最早将太昊伏羲并称的可追溯到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此书在《汉书·律历志下》中有记载。刘歆革新战国时邹衍创立的按照五行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顺序来解说朝代更替的“五德终始说”,提出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将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少昊氏、颛顼、帝喾、尧、舜等原没有纳入帝王世系的都纳入到新五德终始说的体系中,并将太昊、伏羲并称,由此以后,文献中遂有了太昊伏羲氏之名<sup>[7]</sup>。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认为太皞、伏羲合而为一是一是后人造成的<sup>[8]</sup>。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彭官章先生等人对巴人始祖的分析。《山海经》说巴人始于太皞,《路史》说巴人出自伏羲,彭官章先生等人认为太皞就是伏羲,因此以伏羲的来源来定巴人的起源。其逻辑依据的前提是太皞和伏羲是同一人。前面我们既然论证了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则彭先生等人立论的依据就发生了动摇了。不错,如果以《路史》的记载为准,确实可以推断羌人为巴人的始祖的结论,但别忘了,最早记载巴人世系的《山海经》记载巴人始祖是太皞而非伏羲。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关于巴人世系的记载我们应该以哪个为准?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我们首先要从《山海经》和《路史》史料的可信度入手进行了。

从两种文献的时代看,《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时期,《路史》则传为宋代人罗泌所著,从时间上来说,《山海经》的成书时代比《路史》早了超过1000多年,很显然,单

从时间上比较,《山海经》的可信度要比《路史》高得多。另外,根据上文所述,太皞、伏羲本为两个不同的人,只是到西汉末年以后,太皞伏羲才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并传之于世的,考虑到《路史》出现的时代是在太皞伏羲并称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路史》的作者是受了刘歆新五德终始说的影响,认为既然太皞就是伏羲,于是在转述《山海经》中关于巴人世系的时候,将原书中的“太皞”改成了“伏羲”。如果是这样,我们在研究巴人的世系时,就应该以《山海经》为准。因此有的学者也提出“讨论有关巴人的世系,只能以前者(《山海经》)的记载为主,以后者(《路史》)为补充”<sup>[5]</sup>。

因此,如果选择以《山海经》或《路史》中关于巴人世系的材料,笔者认为,应以《山海经》为准,毕竟说巴人源自伏羲是后来之说,可信度并不高,若以此为据,推演出的相关结论必定不会让人信服。

## 二、板楯蛮与羌人问题

巴羌说的另一论据就是认为板楯蛮亦为羌人,此说的主要依据一是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载“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立功,先代复为羌人”,二是《蜀典》卷1载“羌、无戈、爰剑孙各自为种,即武都参狼、广汉白马、巴中板楯,今松潘茂州诸夷也”。

关于板楯蛮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俸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汉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实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sup>[6]2842</sup>

遍观《后汉书》所记,在述及板楯蛮早期历史时,从文中看不出任何板楯蛮夷出自羌人的记载。我们能从该文中能得出的结论是,板楯蛮夷是居住于巴郡渝水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尤以阆中一带分布较为集中;板楯蛮的历史最早仅上及战国时期,而且是因猎杀白虎有功而后为人所知的。汉时渝水即今之嘉陵江,阆中即今四川省阆中市。

另外,同书中还有板楯蛮多次征讨羌人的记载,如:

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巴郡板

楯蛮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sup>[6]2843</sup>

从这段关于板楯蛮的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一是板楯蛮和羌人是两个不同的部族。文中提到的“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这里的“种辈”,是指的羌人,也说明板楯蛮是不属于羌人“种辈”的,也即是说板楯蛮与羌人是不同族,因此板楯蛮不可能是羌人。二是文中提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但彭官章先生等人所引述的《文献通考》卷328却成了“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立功,先代复为羌人”,显而易见,是马端临将《后汉书》中的“义”字篡改成了“羌”,于是就成了“先代复为羌人”了。这明显是后代文献在传抄前代文献时的失误,彭官章先生在引用文献资料时,没有对文献的真伪进行辨别,引用本就有误的文献为据,必然得出不能让人信服的结论。

巴羌说认为板楯蛮为羌人的第二个依据为《蜀典》卷1中的记载“羌、无戈、爰剑孙各自为种,即武都参狼、广汉白马、巴中板楯,今松潘茂州诸夷也”。关于这段文献,笔者以为也存在一些疑点,先叙述如下:

首先,彭先生所引的这段文献中,关于“羌、无戈、爰剑”中的“戈”应为“弋”,“羌无弋爰剑”中间也无需加顿号。这里的“爰剑”为人名,“羌”为族群的名称,因爰剑曾做秦人的奴隶,羌人称奴隶为“无弋”,后来爰剑入羌后就被称为“无弋爰剑”,<sup>[6]2876</sup>因此“羌无弋爰剑”是不应该用顿号分开的,中华书局版1965年版的《后汉书》就是如此处理的。

其次,彭先生这段文献的引用还存在缺漏,《蜀典》的原始记载是这样的:“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又云羌无戈(弋)爰剑子孙各自为种,即武都参狼、广汉白马、汶山冉駹、巴中板楯,今松潘、茂州诸夷也。”<sup>[9]卷14《堪輿类》</sup>彭先生所引文献中“爰剑”后面漏掉了“子”字,“广汉白马”后面缺漏了“汶山冉駹”等字,可见彭先生在引述时并没有核对原始文献。

再次,彭先生在引述这段文献时,没有查看这条资料的原始记载。其实《蜀典》已经讲明了,他的这段论述是源自《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西羌传》关于羌与当时蜀地少数民族关系的记载是这样的:

“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雋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从这段文献来看,《蜀典》中所提到的参狼、白马、冉駹

等都是属于羌族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并没有说板楯蛮是羌人的后裔,可见,《蜀典》中的“巴中板楯”显然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另外,同样是在《蜀典》中,也就在彭官章先生所引文献之后,《蜀典》还说了,“以髡、徙、斯叟、賸为一种,尤误”,又说“賸在巴郡,廩君之后”<sup>[9]卷1《堪輿类》</sup>。从这个记载来看,其实张澍是说賸,也即是板楯蛮是廩君的后裔,与包括羌在内的髡、徙、斯叟不是同一种族。笔者认为彭先生引述这段文献作为板楯蛮源自羌人的证据,有断章取义之嫌。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巴羌说提出的板楯蛮为羌人的论据也是有问题的。

### 三、关于廩君蛮与羌人的问题

巴羌说的另一个依据就是《华阳国志》载“魏武定汉中,(特)祖父虑(当为虎,彭氏校对有误)与杜获、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氏”,《晋书·李特载记》载“魏武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氏”,“李特,字玄林,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由此推断李特为羌人中的一支氏人的后裔,进而认为廩君蛮为羌人后裔。细细分析这些材料,笔者认为据此还不能得出廩君源自羌人的结论。

《华阳国志》载李特家世:

“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賸氏。……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氏。”<sup>[10]361</sup>

《晋书》载李特家世: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賸,因谓之賸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賸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既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氏。”<sup>[11]3021-3022</sup>

这两段文献记载虽各有详略,但对李特的家世及其居住地变化的记载大致是相同的:其祖先为賸人,居于巴西宕渠之地,汉末天下大乱,李特先祖从宕渠北迁至汉中,魏武帝曹操平定汉中后,李特先祖又迁至略阳,遂为巴氏人。通过对李特家世和居住地变迁历史来看,李特的先祖为巴人

中的賸人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賸人的祖先从何而来?根据《晋书》的记载,賸人源自廩君蛮。另外《太平寰宇记》引《晋中兴书》亦载“賸者,廩君之苗裔。巴氏之子务相,乘土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廩君。子孙布列于巴中”<sup>[12]卷138《渠州》</sup>;《魏书》载“賸李雄,字仲儒,盖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sup>[13]卷96《賸李雄传》</sup>。李雄既为廩君苗裔的賸人,则李雄之父李特也当为廩君之苗裔无疑。《通志》载“廩君都夷城,其后世散处巴郡、南郡,谓之南郡巴郡蛮、板楯蛮,始居巴中”<sup>[14]卷41《都邑略》</sup>，“李特字元休,巴蜀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sup>[14]卷191《载记》</sup>,则郑樵亦认为被称为賸人的板楯蛮亦是廩君的后裔,李特为廩君之苗裔。《十六国春秋》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賸氏,即廩君之苗裔”<sup>[15]卷76《蜀录》</sup>。

依据上述文献可知,作为巴人组成部分的賸人(板楯蛮)为廩君的后裔。李特既为賸人的后裔,则也当为廩君的后裔。

如此,则我们就可为所谓的巴氏人李特排定世系:廩君蛮——賸人(板楯蛮)——巴氏人(李特)。从这个世系来看,作为混杂有氏羌文化因素的巴氏人李特,追溯其渊源,应该是巴氏(羌)源自廩君。

从文献记载排定的世次关系来分析,可以断定廩君源自氏羌的说法有误。从李特家族的居住地的变化轨迹,也可有比较明晰的认识。

根据前面的文献记载,李特的先祖是居住在“巴西宕渠”之地,即以今四川阆中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一带。大致在东汉末年,李特的先祖迁入汉中,即今陕西汉中市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攻占汉中,李特先祖又西迁至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天水东北)定居。

据《三国志》记载,魏武帝(即曹操)破张鲁踞有汉中的时间是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年<sup>[16]45</sup>,即公元215年。又据《晋书》记载,李特随流人人蜀是在晋惠帝元康年间<sup>[11]3022</sup>,即公元291—299年间,如果李特的先祖是在魏武帝攻占汉中的公元215年左右迁入陇东略阳郡临渭县境的话,则李特家族在略阳郡,也即氏羌之地生活的时间大致有七八十年。在这期间,李特的先祖们与氏羌相处融洽,深得氏羌得拥戴,李特的父亲李慕甚至作了“东羌猎将”,生活习俗也受到氏羌人的影响,李特“雄武善骑射”<sup>[11]3022</sup>,与“以射猎为事”的羌人没有什么分别<sup>[6]2875</sup>,李特俨然就是氏羌人了。由于李特先祖及其家族在氏羌聚居区生活数十年,他们已具有了羌人的一些特征,但他们原为巴人,因此“北土复号之为巴氏”,以区别于当地的土著氏羌部族。

通过对李特家族居住地的变化以及他们由巴人到巴氏人的转变过程的梳理和分析,在结合李特家族原本为廩君后裔的史实,也可说明以巴氏人李特家族为据推断廩君蛮为羌

人的做法是源流倒置了。

这里彭官章先生等人的错误在于对李特等“巴氏”之名的来历没有深究,错误地将原本为源的廩君蛮错当成了流,把原本为流的氏羌(主要指李特及其家族),错当成了源。

#### 四、关于父子连名的问题

巴羌说有疑问的第四个论据就是任乃强先生《羌族源流探索》的观点“七姓賨民王莽时有任文公、任文孙父子并著于正史……文公文孙是有姓而父子连名,不同于汉族父子避讳之俗,可知其族源为羌矣”<sup>[17]</sup>。

任乃强先生的《羌族源流探索》提到父子连名,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父子连名制进行解释。黄勇综合芮逸夫、江应樑等前辈的观点,认为“父子连名制是子名从父的一种命名制度,故又称子从亲名制。简而言之,即子之名部分取自其父,父名与子名有文字意义上的联系,或于子名前,或于子名后,二者循环往复,代代相连,形成环环相扣的人名大系统”<sup>[18]</sup>。

在我国,实行父子连名制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彝族、哈尼族、白族、羌族、景颇族、珞巴族、基诺族、佤族、布朗族、拉祜族、怒族、苗族、高山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广西大瑶山的瑶族等。可见父子连名制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羌族所独有。

重新回到任乃强先生提到的王莽时期的任文公、任文孙父子身上,若从父子连名制的一般意义来看,其实任文公、任文孙命名方式上不属于父子连名的范畴。首先这两人有独立的姓氏,在名字前都贯注了姓氏“任”。其次,如果按照父子连名制来命名的话,任文孙应该叫“文公文孙”或是“公文孙”才对,显然,任文公、任文孙的命名方式不属于父子连名之例。

不过,任文公、任文孙父子二人的命名方式确实与汉族的命名方式不一样,按照汉族的命名习俗,父与子的排行或字辈是不一样的,按照汉族人的一般命名方式,首先为姓,然后是字辈,最后才是名字。如据此来看任文公和任文孙,

他们的字辈都是“文”,在汉族看来父、子就是同辈了,这在汉族命名系统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笔者以为,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惊讶,因为任氏父子本为賨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也就是汉人称之为“蛮夷”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在汉化,但汉化还不彻底,于是出现了这种半汉半賨的名字。

正如前文所述,任文公、任文孙父子的命名方式不是父子连名。退一万步来说,即是这种方式带有父子连名的性质,那也不能就此断定他父子二人是羌人,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国很多的少数民族也都是实行父子连名制的。

#### 参考文献:

- [1] 彭官章. 巴人源于古羌人[J]. 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3):40-44.
- [2] 屠武周. 伏羲非太昊考[J]. 东南文化,1990(4):20-25.
- [3]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811.
- [4] 魏嵩山主编.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995.
- [5] 杨铭. 巴人源出东夷考[J]. 历史研究,1999(6):36-50.
- [6]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王剑. 太昊伏羲考辨[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4):112-115.
- [8]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9.
- [9] (清)张澍. 蜀典[M]. 清道光二年刻本.
- [10]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 [11]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宋)乐史撰. 太平寰宇记[M]. 四库全书本.
- [13] (北齐)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4] (宋)郑樵撰. 通志[M]. 四库全书本.
- [15] (北魏)崔鸿撰. 十六国春秋[M]. 四库全书本.
- [16]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7] 任乃强. 羌族源流探索[J]. 民族研究通讯,1979(2).
- [18] 黄勇. 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父子连名制的语言文化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1994(1):95-9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Doubts about the Origination of Ba Ethnic Groups from the Ancient Qiang People

ZHU Sheng-zh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opinion that the ancient Ba ethnic groups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Qiang people, bu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disagrees with them. He proves his idea from four aspects. They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 grandfather and Taihao and Fux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dun people and Qiang ethnic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jun people and Qiang people, and Fuzilianming system ect.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all of the four proofs are unbelievable.

**Key words:** Ba people; Qiang people; Taihao; Fuxi; Bandun people; Linjun people